

媒介与社会书系（第三辑）

电视与西藏乡村 社会变迁

泽玉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媒介与社会书系（第三辑）

电视与西藏乡村 社会变迁

泽玉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电视与西藏乡村社会变迁/泽玉著.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8

[媒介与社会书系(第三辑)]

ISBN 978-7-5657-1062-9

I. ①电…

II. ①泽…

III. ①电视—影响—乡村—社会生活—研究—西藏

IV. ①D6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49080 号

媒介与社会书系(第三辑)

电视与西藏乡村社会变迁

著 者 泽 玉

策划编辑 范明懿

责任编辑 曾婧娴

封面设计 众为设计

责任印制 曹 辉

出 版 人 王巧林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28 65450532 传真: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6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7-1062-9/D·1062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本书是在作者的博士论文
《电视与西藏社会变迁中的乡村生活》
基础上修订完成的

本书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西藏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成果
(10JJD860006)

本书由西藏民族大学赞助出版

序言

西藏课题的研究与研究者之间，似乎有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谁来做？谁最有优势承担此类任务？的确，对于大多数其他地区的学者来说，西藏社会、藏族人的生活远离我们的经验世界。偏远、高寒、缺氧、酥油、糌粑、藏语、藏传佛教……有关西藏和西藏人的叙述常常与梦幻连在一起。这一切的一切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陌生。陌生的高原生存条件、陌生的高原民族、陌生的语言、陌生的习俗、陌生的宗教、陌生的文化……除了青藏铁路，西藏和现代化生活少有连接点。人们出国一次不足称道，可进藏一次却常被视为传奇或冒险。

这时，我们遇到了泽玉。

泽玉的身世颇有些传奇色彩：她是西藏林芝尼洋河边土生土长的藏族孩子，母亲童年曾在西藏一个大庄园里当仆人。泽玉 12 岁到绍兴入读第一批西藏中学。大学毕业后，她在西藏电视台当了十年记者，常年奔波在西藏的高山深壑、乡村寺庙之间。她精通藏语，藏地人脉广泛，采访报道驾轻就熟。

毕业十年后，她放弃电视台的职位，迈进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今天，泽玉博士已执教西藏高校。这种“课堂——实践——再课堂——再实践”的经典人生曲线，使她得以在西藏的城乡、电视新闻编辑室和高校科学研究的殿堂里自由穿梭。

泽玉的水平、能力、经验、专长与这个西藏课题有着高度的契合性。这些“硬件”使她很自然地成了这个分课题——《电视与西藏乡村社会变迁》最合适的领头人。

然而，与这个课题相适应的不仅仅是泽玉的“硬件”，还在于她对家乡的历史认知和对藏地生活深入骨髓的理解。可以说，泽玉是“懂”西藏的。

这种“懂”，使她得以立足“常识”，善辨真伪，秉持一个学者客观公正的态度。这种“懂”，在西藏研究中至关重要。

由于高寒缺氧难以抵达，由于语言不通难以沟通，西藏在世人们面前总是呈现出一种隐隐约约的“神秘”形象。有关西藏的历史和现状，充斥着迷雾重重的腔调和声音。

面对种种论调，泽玉显示了她出色的辨识能力。

母亲终日食不果腹、贫病交加的血泪童年，使泽玉深知西藏农奴解放的意义。

泽玉的家人信仰藏传佛教，她常陪家人上寺院，还交了不少喇嘛朋友。她也常对朋友说：“作为藏族人，要理性地对待宗教生活，更要了解宗教给藏族带去的种种负面能量。谁能让最普通的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谁才真正值得追随、值得信仰。”

面对这一群群风餐露宿、磕长头朝拜的藏族百姓，泽玉讲起自己苦命的外公外婆：一对从藏东地区不远千里向布达拉宫磕头朝拜而来的贫苦人，却死在朝佛的路上，丢下一双年幼的儿女，孤苦伶仃、无依无靠。

穿行在寺院的缕缕桑烟中，她会缓缓地讲述家乡人民笃信佛教的代价。

家乡老百姓对现代生活的期盼，使泽玉对西方人的西藏观嗤之以鼻：“那是因为他们不是藏族人，他们自己用着卫生间，每天能淋浴，却希望西藏人永远住牦牛毛帐篷来保持西藏的‘纯洁性’，这不公平！”

泽玉能获得西藏课题研究资格，更重要的是她对家乡那种血脉相连的情感，是她对建设西藏舍我其谁的强烈责任感。

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课堂上,她是一个提问最多、求解最急切的学生,她的口头语是:“为什么我们西藏那边……”

对家乡日新月异的进步,泽玉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我大学毕业后,连宿舍里的衣架都带回家了,因为拉萨没有卖的,可是你看现在,什么都有了!”

当我们走在拉萨的大街小巷时,泽玉会随时指着一堵墙、一幢建筑,或一群老人向我们介绍说:“这里原来是……”

她太在意这块土地了!为它流汗,为它流泪,为它急匆匆前行的蹒跚步履着急。

两年多的时间里,泽玉带着调研团队塌下心来,走访了多个藏族村落,一家一家地入户观察,用问卷、用访谈、用实验方法去了解 and 感受电视节目给西藏乡村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婚恋带来的变化,收集农牧民对各类电视节目的看法,倾听他们的收视诉求。集结在这本书中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中,有数字、有背景,更多的是发生在农牧民家中一个个鲜活的故事。

作为导师,看到泽玉的成长我很欣慰。她脚踏实地的作风,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份西藏电视的乡村效果研究答卷。这个成果虽不完善,却很扎实,从中我们看到一个个真实的、演变中的西藏乡村,一个个真实的乡村电视传播图景,更看到一个藏族年轻学者的成长,看到她奔跑的速度和灿烂的笑容。

期待泽玉更多的研究成果。

张 征

2015年春,北京

前言

对西藏人来说,自上世纪开始的社会变革,把每一个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其中。这些鲜活生命的个体体验无法仅仅用枯燥、单调的数据以曲线或柱状图的方式让世人真切触摸。巨大的社会变革带给西藏人的既有经济发展、文明传播、教育进步等领域的喜悦,甚至是感恩;也有文化冲突背后的紧张、民族自我认知重构的焦虑和对社会经济急速发展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的担心。

西藏自治区人口不足 300 万,土地面积达 122.84 万平方公里,农牧业人口占 81.5%。农牧业人口的发展是整个西藏发展的关键。农牧民强烈的发展愿望被闭塞的交通、滞后的教育、恶劣的自然环境、传统的观念制约着。依据这一百多万平方公里不同的地域制定适宜的发展策略并加以实施,对任何政府来说,都是浩大、艰巨的工程,这几十年来国家对西藏发展不断投入人力、物力、财力,让西藏社会整体上摆脱了贫穷落后。现阶段,西藏的发展要迈上一个新台阶,需要整合力量,发现发展中积累的问题后不断调整措施。无论进行何种调整,人的思想和观念的变化,都是各种变化中一个关键的环节。观念、思想的变化往往需要两三代人的时间,在基础比较薄弱的条件下,媒介的替代功能是不可忽视的。

随着中国在国际地位上占据越来越显著的位置,西藏的种种问题也屡屡被放置于世人关注的焦点中。无论是以学术

的视角关注西藏的政治问题、人权问题抑或是环保问题,还是闲谈散论中谈及高原古域的变迁,若不单以统计数据为标准加以评述,而是能深入到农区牧家,以体验的方式了解藏家人生活中的多维度变化,无疑能更客观、准确地认识西藏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巨变。

西藏传媒的诞生原本就源于社会变革,依托于政府的扶持而急速发展。发展传媒业的目的之一是希望它能开拓人们的视野、传播知识、改变生活方式,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发展。囿于各种媒介的传播特性和西藏农牧民的接受能力、喜好等原因,电视成为西藏农牧民最喜爱的媒介。尽管西方传播研究中有关于电视传播产生负效果的理论层出不穷,但在西藏乡村实际的发展中,电视传播产生的正能量远大于副作用,它已经深深根植于西藏乡村社会,与农牧民朝夕相伴。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上,一群年轻人围坐在太阳能板带动的小电视机前,专注而欢乐的情景必然会打动人心。以往,这高山上,伴随他们的只有呼啸的风声和小鸟偶尔飞过时的鸣叫声,而今,电视机的声音可以让他们在雪山上放眼世界,我终究也是相信,这样的声音会让他们走出大山,去体验外面的生活。

我和母亲,两代藏族妇女,因成长的时代不同,生存环境差距巨大。母亲在不惑之年,用她辛苦攒下的钱买了第一台电视机,而我在不惑之年,已有从事电视媒体近二十年的工作经历。同一个媒体带给我们两代人的改变有同有异。在私人庄园中长大的母亲不识字,电视带给她太多的外部资讯,也让她有了打发时间的良方。当母亲迷信电视中反复宣传的某一事件时,我的解释常常无法压倒电视已在她心中树立起来的权威性。每每面临这样的境况,我都感受到在我们家庭中电视机在替代我们思考并作出了决定,家人往往忽视这些信息是幕后的工作人员秉承某种需求而做出的结果。更多的时候,我由衷地为母亲看电视时能获得快乐而感到高兴,她能有那么多的闲暇时间看电视,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切身感受到了电视的威力,我的工作也从电视节目制作转变成电视传播效果研究了,我最强烈的心愿是希望电视传播能发挥更大的影响,给

人们带去更好的生活。不能不说,前辈研究中提到的电视传播负面效应或多或少是存在的,而在这一本书的论述中,我更多阐述和表达的是电视传播带来的正能量、发挥的正效应。并非视而不见种种负效应,只是发展对西藏来说是一个非常急切的问题——每当我翻越数座高山,停歇在某一个偏远的乡村时,那闭塞的环境、蒙昧的状态都让我不能自己地希望村民们掌握更多的知识,能过上更安全、更健康的生活。

如果有一个可以表述意见的平台,那么,最应该涉及的话题是:西藏电视媒介在发挥“喉舌”功能的同时,需要传播更多生产生活类的信息——普通百姓的富裕、幸福本身也会促进社会稳定。改变电视的话语,不仅仅是一个专业领域的问题,更是一个政治话语和实施管理的问题。

将数月调研的内容汇集于此,不为电视传播歌功颂德,只是希望读者多一个了解电视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效果的视角。从学理上来说,是诸多因素改变了农牧民的生活,电视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电视传播者的专业技术、务实作风是推进和改善社会信息传播的有力武器,太多话题需要设计和展开,太多观念需要耐心细致地解说后再逐步树立新思想。需要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传播理论的基础上,发展本土化的传播学理论。研究西藏问题无法照搬西方理论,适宜于本地气候的研究才能解决本地的实际问题。

我惭愧自己做了十数年的电视节目,却没有全面了解受众的需求,尤其是农牧民受众的需求,有时仅为完成宣传任务而摄制新闻专题,有时甚至为了追求快捷和浅表的效果,不断接触“采访专业户”,还有很多时候节目中用大而空的话语表现“高度和深度”的内容。限于学识、见识,有时了解了受众的某种需求,却不知怎样用更合适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整个电视从业过程中几乎没有培训、缺乏指导,孤独的从业路上不乏被“专业主义精神与现实教训冲突”敲击的时候。孑孑前行,不甘放弃,唯有通过一次次努力,获得更多力量的支持。

而今,回头看,也有无限欣慰的时候——古荣糌粑兄弟因出现在我们

的镜头中，糌粑大卖；拉萨北郊粉尘漫天的水泥厂被我们频频曝光，终被关闭，这样的美好记忆让我感觉没有虚度光阴。受众的需求总是在那里，社会的发展也总是需要担当和勇气，任何时候，去实现“新闻理想”都不迟——现在的“新闻理想”便是收看到更多有助于农牧民生活改进的资讯节目，让他们思路更开阔、更有知识，靠自己的能力过上富裕的生活。

社会在矛盾和不断地变化中如同无法停歇的巨大机械，无论我们怀有怎样的感受和期盼，它都不会以人的意志而转移，它总是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演进着。在这样的情态中，藏族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追求幸福、快乐生活的本能——将一个经济相对滞后的民族当作社会研究的样本，希望保存其固有的生活方式而不要改进，这是本位立场上的利己主义；而以发展和改进为目的，却不加以调适地施以外力，希望有加速度的奇迹发生，这本身也违背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希望通过笔者展示和描述西藏在这半个多世纪中由于媒体介入发生的变化，理解西藏人民想过上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理解他们时下因信息匮乏而产生的种种困扰，看到他们因为信息获取渠道的改变增加了对世界的理解，补充、更新了改变生活的方法。这一切变化将为西藏面貌的改变发挥极大的作用，为整个民族的进步、繁荣增添动力。

人生是一个不断修行和自我完善的过程，一本书、一个观点也是如此。尽管这本书还有许多未尽之言，也有许多可以再深入的地方，念及岁月尚长，就让自己再不断学习、持续思考，逐步加以补充、细化。

恳请师长、友人不吝赐教，帮助我，修正我不成熟的观点。

泽 玉

2014年冬，西藏民族大学

1	第1章 绪言
1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8	1.2 文献综述
16	1.3 研究方法
22	第2章 传播与西藏社会
22	2.1 传统传播方式
31	2.2 新西藏建立与大众媒介的诞生
35	2.3 各种媒体在西藏乡村扮演的角色
43	2.4 西藏电视事业的发展
60	第3章 电视与乡村的变化
60	3.1 电视功能与西藏乡村现代化过程
72	3.2 电视与西藏乡村自我认知
80	3.3 电视与乡村政治
87	3.4 电视与乡村生活品质
104	3.5 电视对日常生活与婚恋的影响
109	3.6 电视与乡村娱乐
113	3.7 电视与宗教生活
128	第4章 电视在乡村的挑战与突破
129	4.1 乡村社会的存在
151	4.2 电视传播内容优化思考

184	4.3 电视在乡村传播的深化
198	4.4 电视传播有所突破的核心节点
209	第5章 未来与希冀
209	5.1 电视：下一阶段目标
213	5.2 前路：新媒体进入乡村生活
217	5.3 期待：融合、弘扬与突破
221	结 语
225	附录1 在藏调查地点图
226	附录2 调查问卷
238	主要参考文献
240	致 谢

第1章 绪言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在西藏发展的历程中,大众媒介在近60年中对社会的影响辐射到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

大众媒介在西藏的产生完全是从外部植入的。腐朽的旧西藏政府在上世纪中叶已经沦为完全和世界脱轨的状态,当时的世界包括电视在内的大众媒体已经深入到西方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在战争中充当说服者时,自诩为“喇嘛王国”的西藏依然用佛教的法力解决着领土纠纷。

1946年,西藏“民众大会”向南京“国民代表大会”递交了一份报告书,该报告书的第9条内容如下:

“当今世界有许多大国取得了空前的财富和权力,但是只有一个地方在致力于人类世界的幸福安宁,那就是实行政教合一制度的佛教乐土西藏。如果西藏的反对者和敌人不设障碍,不开战端,不再继续占领从前夺去的那些地区,凭借‘三宝’和佛教护法神的威力,世界各族就不可能受战争饥饿等灾难之苦。这对于个人和群体的和平幸福都是至关重要的。”^①

回望历史,揣摩当年“西藏政府”官员郑重执笔写下的这段文字,一个自我美化、活在臆想中的“喇嘛王国”跃然而出。这个所谓“喇嘛王国”的执政

^① [美]梅·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9页。

者似乎浑然不知普世的幸福安宁为何物，完全无视 95% 的被奴役的人们的生存状态，大谈全人类的幸福，他们甚至装作不知雪域外的世界发生着怎样的变化——尽管他们已经多次派出访问团与其他地区乃至西方国家接触。在世界强国用武力争夺领土时，还寄望于用佛教护法的言论改变领土纠纷。他们沟通交流的语态已经和世界脱节，不在相同的话语情景和思维逻辑中。

彼时的世界和祖国发生着宗教王国难以想象和应对的改变。始于 18 世纪中叶的西方工业革命将人类的文明推至全新的发展高度，电报、电话、广播、电视、飞机等让人类拥有千里眼、顺风耳且能日行千里的神话变成了现实。凭借科技，人类对时间和空间的掌控和利用超越了人类历史的任何一个时期。

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封建清王朝的国门被打开了。一个羸弱的封建国家被生生地拖进了一次次力量悬殊的战争中。国人历经了王朝迭变、战火洗礼，苦难一波接着一波。东方强国的自诩早已消散，无数的仁人志士励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以求国力强盛御外辱。

而此时，远在高原的“喇嘛王国”虽不曾饱经战火，但也与科技发展几乎毫无关系，直至 1937 年，根敦群培还在用“地球是圆的”说服他的老师^①。这一时间前后，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见过灵光一闪的电灯泡，用过将人像印刻在相纸上的照相机，听过会发声的广播，更多的民众在苦难生活的边缘只求生存。在这样的态势中，西藏的管理者却高调地宣称他们在“致力于人类世界的幸福安宁”，企图用高深的佛教理念换取政治上的利益，并不断拒绝社会的发展，意图存续“喇嘛王国”的统治，抵触社会变革。

依照学者梅·戈尔斯坦的分析，从 1910 年到 1994 年，西藏共有三次传统与变革之间潜在的转折点，每一次转折遭遇冲突后，西藏选择的都是“深深根植于传统制度和思想观念中的发展道路”^②。寺院集团极其害怕任何变革会有害于寺庙的经济基础，也不利于西藏佛教的“价值”垄断。在这样的

① 根敦群培著，格桑曲批评译：《根敦群培文论精选》，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64 页。

② [美]梅·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715 页。

情态下,既没有大众媒体诞生的土壤,也没有大众媒介发展的空间,整个西藏和大众媒介快速发展的外部世界处于割裂状态。因地理因素之故,西藏和世界各地在交往通达上原本就有着种种障碍,信息不流通,致使这一片土地更加封闭,外人难以抵达,内部也鲜有改善、创新之能力。

1959年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和祖国命运紧密相连,百万民众经历了民主改革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喜悦,拥有了历史上不曾想象过的自由状态,苛捐重负都已成了记忆中的苦难。改革开放后,西藏与祖国其他地区同步进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进程中,谋发展、奔小康成为西藏社会前进的动力,成为千百万普通西藏人平实的中国梦。

在众多研究推进社会平稳发展的课题中,电视媒体的覆盖和传播成为一个特殊的研究场域——电视媒体既是推动西藏发展的有力工具,也是研究西藏变迁的对象,电视展示的西藏城乡发展面貌成为研究者考察西藏发展的重要内容。对于从宗教世界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广大民众而言,电视对他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和牵引作用更是值得深入分析。即使是新媒体掀起阵阵尘嚣,最广大的西藏农牧区依然被电视媒体“统领”,呈现出独有而稳固的传播环境。

对电视作用于西藏发展的研究,既应该放置于国际、国内的大环境中考察,也不能忽略它独有的特殊情况。国际上,西方反华势力屡屡借助十四世达赖的种种活动向中国发难,多次拿西藏的人权、宗教自由等问题做文章,刻意忽视西藏的进步、繁荣和发展,对旧西藏的状况鲜有提及。十四世达赖集团也不断在利用西方的力量和自我培育的力量给我国政府制造事端和麻烦,让西藏的稳定问题屡屡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问题交锋碰撞,迫使西藏社会不时因维护稳定而耗费大量的人财物力,也使得广大农牧民不时会在思想上受到“不同声音”的干扰,而缺乏识别力的个别农牧民容易误入歧途,影响到正常的生产生活。同时,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快速发展,随之也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西藏虽与外界高山相隔,但这些盘根错节、难以在短期内解决的社会问题同样也是西藏发展中面临的难点和障碍。更为特殊的是,在应对国际问题和社会发展问题的同时,西藏最具有个性的问

题——宗教带来的特殊影响始终与人们的生活相生相伴。

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西藏电视在“守土有责、导向正确”的方针之下,要肩负政治传播、舆论引导、政策告知、社会安抚、娱乐大众等职责,既拥有极大的内容选择,也承担着莫大的社会责任。在某种程度上讲,西藏电视的内容传播在一定时间或区域内对受众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影响超越了我们能想见的任何一种传播方式。

现代的西藏人在多元的价值观冲突中不断自我调整,从全新的角度开启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之门,但受文化知识的限制,距离实现理性、客观认识世界的目标还有极其遥远的路程。新西藏社会秩序重建累积的经验使政府现在还没有来得及悉数总结,新的任务又开始了,只能不断“摸着石头过河”。在这个过程中,统一认识,减少摩擦,顺利展开经济建设,让人们过得富裕幸福是第一要务。实现这一要务就得落实邓小平早年提出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思想,但要平衡两手的力量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社会管理工程,尤其是精神文明建设更是非常考验智慧的工作。各方人士都认识到,西藏从一个陈旧的社会制度跨越到另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单纯的经济发展并不能给人们带去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不同文化模式下的价值观对社会产生的作用力、对人们观念的塑造带来的影响与经济发展有着同等的重要性,而电视在影响思想、塑造观念上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要建成和谐社会得处理好不同地域、群体、事物、文化、价值观之间的关系。要使各种关系“和谐”,电视传播在构建和谐关系中起到的纽带和桥梁作用不容忽视。

西藏大众媒介传播领域是随着新制度建立而发展起来的全新领域。电视在大众媒介中最为适应西藏的传播环境(这一传播环境包含传播条件、民众接受偏好、影响深度等方面)。相对来说,在西藏,信息传播、宣传教育、舆论引导、娱乐大众等媒介功能通过电视实现得更为充分。如今西藏人真实享受到的幸福在电视中有生动、客观的展现,他们的各种愿望和生活上的问题也会通过电视反映出去。为了让他们的生活更加富裕、愉悦、和谐,电视极力为他们提供各种政治、经济、文化信息和娱乐节目。